

改革時期的少數派聲音

● 申明民



余征主編：《〈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上、下冊（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

1989年後，黨在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加強了意識形態和黨的組織建設。這種轉變的政治力量基礎乃是對改革的市場化走向持懷疑態度、對改革造成的「非黨化」現象持反對態度的保守勢力的集結，以此為契機他們創辦了《高校理論戰線》、《中流》、《當代思潮》等刊物作為宣傳輿論孔道。

1989年的確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說此前改革只是在舊體制的基礎上行進的話，那麼此後則主要是在改革自身後果的基礎上展開。就在1988年，黨的總書記提出了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觀點，意指改革已產生了複雜的社會後果——包括它自己的制約和反對力量，而不再是一個單向推進的過程。當年遍及全國的學生抗議運動

只不過是這種困境的強烈表現。1989年後，雖然鄧小平強調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但實際上十三大的某些重要觀點卻銷聲匿迹了，黨在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進行了實質性的策略調整，尤其是加強了意識形態和黨的組織建設。這種轉變的政治力量基礎乃是對改革的市場化走向持懷疑態度、對改革造成的「非黨化」現象持反對態度的保守勢力的集結。他們絕大多數是在改革之初即退出權力一線的老幹部，由於參與較少而對改革的負面後果缺乏寬容，他們所有觀點的核心就是肯定傳統社會主義，1989年事件為他們提供了要求限制改革方向的絕妙藉口，以此為契機他們創辦了《高校理論戰線》、《中流》、《當代思潮》等刊物作為宣傳輿論孔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於1990年7月創辦的《真理的追求》則是其中導向最鮮明的理論旗幟。《〈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是1990年7月至2000年7月間《真理的追求》雜誌發表的主要文章的彙編，它相當完整地體現了這十年間有關改革的保守主張，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有關改革的意見分歧。

從思想基礎來看，保守觀點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之普遍適用性，尤其是全盤繼承了馬克思對市場的批判態度，認為資產階級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是市場的本質特徵。以此來評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它特別強調其民主、自由、人權的階級性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危險性。它從列寧有關帝國主義侵略性的論斷出發，解讀中國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利益衝突。很明顯，對於每一個脫胎於現存學校政治教育體系的人，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說教，但有所不同的是，它們在這裏恢復了原初意義上的戰鬥性，是作為與社會主義世俗化的強大勢力相抗爭的「匕首和投槍」出現的。比如，對於備受推崇、早已佔據了主導地位的西方經濟理論，保守派不僅以「庸俗經濟學」的不屑姿態對待之，而且首先將其解讀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政治的角度將其樹立為反動。它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因此，階級分析方法在中國現實政治中仍是有用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它是中共在1999年「法輪功」事件後恢復了的「無產階級思想不去佔領，資產階級思想就必然去佔領」觀點的極力推動者。

在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上，保守觀點盡最大可能肯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肯定過去用階級觀點對歷史所做的正統解釋，它將改革嚴格地定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加強。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是與反思歷史的潮流並行展開的，最初只是限於反思「文革」，進

而「文革」成為某種社會主義模式的典型受到解剖和批判，沿此理路上溯，社會主義所代表的革命模式亦受到整體性質疑。對於這種傾向，保守派高度警覺，堅決反對任何有可能損害社會主義形象的反思歷史的努力。比如，關於辛亥革命所開關的激進的政治現代化道路的負面效果、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對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積極影響等反思性觀點，一律受到百分之百的批判。尤其是圍繞中共黨史、1949年後中國當代史，從史論的基本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脫離政治的『純』史學」？）到若干具體問題的評價（比如工業化戰略的得失、對建國前30年經濟建設的評價、對毛澤東的評價、腐敗問題等），它維護共產黨真理化身和絕對領導地位的立場和意圖得到了充分體現。這種立場的選取，是因為它意識到，否定歷史往往會導致整個大廈的坍塌，「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在這裏，它從蘇聯演變的歷史中汲取了不少教訓，它認為，蘇共倒台和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加控制的對蘇共歷史的歪曲、中傷，導致了對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和馬列主義的完全否定，引起了思想上的極度混亂。在這本書中，有相當篇幅的文章是為斯大林辯護的，這與社會主義觀點對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形成了鮮明對比。

由於中國改革前的政權危機是多方面的，所以改革必然會在社會和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連帶效應；但另一方面，鑒於共產黨政權的政治性質，起初只有經濟改革在意識形態上是可接受的。所以，經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是與反思歷史的潮流並行展開的，社會主義所代表的革命模式受到整體性質疑。保守派堅決反對任何有可能損害社會主義形象的反思歷史的努力。這種立場的選取，是因為意識到，否定歷史往往會導致整個大廈的坍塌，「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保守派從蘇聯演變的歷史中汲取了不少教訓。

在經濟改革所引起的敏感問題上不迴避發表意見，是保守派的一個突出特點。比如，對私有經濟崛起所產生的政治後果，它直言，中國已出現了一個靠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為生的資產階級，並在某些地方已取得政治上的相當地位，因此，它要求堅決執行黨於1989年做出的「不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的規定，否則，黨有可能面臨變色的危局。

經濟改革從一開始便承載着過多的使命，「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表明，改革設計者寄望經濟改革能解決廣泛複雜的社會政治問題。這種政治隱退或寓政治於經濟之中的改革模式進展到一定階段，表露出來的經濟問題就日益政治化。在經濟改革所引起的敏感問題上不迴避發表意見，是保守派的一個突出特點，《真理的追求》所發表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就此展開辯論的。比如，公有制的政治地位和性質問題，可以說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界定問題上退卻的「底線」。因為不再將「公有制為主體」當作本質屬性的社會主義，將成為徹頭徹尾的民主社會主義。因此本書中有關的幾篇文章堅決反對將公有制視作一種單純的經濟手段，而且，它還反對對公有制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進行新的詮釋，反對將股份制等生產的社會化制度形式理解為公有制，反對將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理解為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與此相應，它對非國有經濟亦採取了傳統的態度，它迴避「私有經濟」的說法，而寧願使用「私營經濟」概念，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對社會主義是否能容忍私有的問題的不同態度；它反對私有制在經濟效率上優越於公有制的認識，反對產權神話，反對任何形式的或明或暗的非國有化；它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區分的重大政治意義在於，在黨和國家憲法已明確提出「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形勢下，表明對私有經濟登堂入室的反對態度，從中也不難看出對黨的政策走向的不滿情緒。保守派

對私有經濟崛起所產生的政治後果（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後果）也極為敏感和警覺，它直言，中國已出現了一個靠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為生的資產階級，他們主張政府「為納稅人服務」，並在某些地方已取得政治上的相當地位，因此，它要求堅決執行黨於1989年做出的「不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的規定，否則，黨有可能面臨變色的危局。

在共產黨的改革中，出現意見分歧是必然的，江澤民曾總結說：「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一種是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開放（《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由於這一講話是在1989年的特定政治環境下作出的，因而並沒有把反對改革的意見當作主要問題提出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既要反右也要防左」的精神，就是對江的這一看法的糾正。實際上，在改革問題上存在三種意見主張：第一種要求朝着西方制度模式改進，常有意無意地忽略意識形態上的問題，這可以稱作激進觀點；另一種與此相反，可以稱為保守觀點，它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基礎是不可變更的，改革只能限定在完善社會主義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範圍內，它考慮問題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情結，要求「政治上正確」；第三種觀點體現為當政者的政策體系，與漸進改革路徑選擇相適應，它在激進和保守觀點之間進行平衡並產生一種穩健的改革主張。

隨着改革的推進，保守派力量越來越受到削弱，可以說，自從最

高層下定了改革決心以後，保守派在對政策取向的影響上就一直處於少數派地位，因為無論它怎麼做，都以不改變改革本身為限度。在1989年後，可以說它的少數派地位已注定無法扭轉，由激進派倡導走向的改革已踏上了一條不歸路。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對於維護穩定的改革秩序來說，保守力量與激進力量同樣重要，二者都承擔着不可或缺的制度功能，失去了任何一方，改革的自我控制系統都會因失衡而破壞。絕不能忽視保守觀點的正面功能，它對漸進改革的平衡推進發揮着不可取代的功能，是中國漸進改革的模式選擇所必須的，它不但在時時提醒改革者在行動時注意並重視腳下的基礎到底是甚麼，而且在激進改革派還不夠成熟的情況下，起着維護國家穩定的功能。因此，改革作為邁向民主社會的過程，應當對作為少數派的保守力量給予應有的尊重，否則，所謂的改

革派也只不過是在鍛造新的專制，民主不可能瞬間從天而降，也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能宣稱代表民主。

正如其在本書前言中所表明的那樣，保守派「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真理的追求》所形成的「論戰」風格是極其鮮明、犀利的，「被混蛋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它常常對很有權勢的社會名流進行公開點名批評，對改革時期的官僚腐敗作言辭激烈的抨擊，甚至對黨的領導人已講過的東西提出異議。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噪音」竟然能在中共輿論控制的環境下存在！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它表明中共的輿論體制對保守觀點預留了自由言論的孔道，也就是說，保守派的聲音對言論自由進程起着促進作用，正是（或許只能是）保守派的存在使現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接受言論自由，體制改良的可能性也由此蔭生。

《真理的追求》所形成的「論戰」風格是極其鮮明、犀利的，它常常對很有權勢的社會名流進行公開點名批評，對改革時期的官僚腐敗作言辭激烈的抨擊，甚至對黨的領導人已講過的東西提出異議。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噪音」竟然能在中共輿論控制的環境下存在！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王苗作品；文字：金觀濤。

頁8、34、79、139 資料室圖片

頁30、31 劉小軍作品。

頁63 方唐：《假如》。

頁76 趙清閣：《白蛇傳》（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封面。

頁97、98、99 方元提供。

頁100、封底 何應豐提供。

頁108 *Nature* 410, 419 (22 March 2001).

頁131 《當代中國文化名人傳記畫冊·夏衍》（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

頁137 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封面。

頁14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

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封面。

頁149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封面。

頁152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cover.

頁155 西美爾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李猛、吳增定校：《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封面。

頁158 余征主編：《〈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上、下冊（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封面。

封三 「進念·二十面體」提供。